

悼吉錚

徐 訔

先是友人謝靜吾告訴我，他碰見一位美國回來的同鄉，談到吉錚逝世的消息，我聽了吃了一驚。後來，想可能是另外一個吉錚——紀存，濟曾，或其錚？接着我看到有人引了於梨華悼吉錚的文章，我還是不敢全信，我寫了一封信給於梨華，一封信給范思綺，請他們告訴我確實的情形。於梨華回我信，還寄給我她在中央日報發表的悼吉錚的文章，范思綺來信也附來她在純文學上發表的紀念吉錚的文章。她們的文章都是情文並茂，感人甚深。但是我讀了並沒有流淚，我感到的是一種空虛與幻滅。吉錚之死雖是個人事情，但也正是一個有天賦的人與生活間衝突的結果。

我在芭城的時候，住在范思綺的家裏，由於她的介紹，我認識了吉錚。但是約定在圖書館見面，吉錚來的時候，思綺還沒有出來，我們就逕先招呼了。

她的笑容是直率而美麗的。

後來好幾次我們在一起。在一起吃飯時，吉錚把她「拾鄉記」的書名同我商量，我因為沒有讀過她的書，很難出甚麼主意，只是就自己對於書名的反應告訴她。一起在車上時，談到她們的家，她們對自己的生活都嘖嘖有怨言。不滿現狀原是人類進步的力量。但我當時想到她們的環境正是臺灣千萬的青年女性的夢想。——到美國嫁給一個有學問有好的收入的丈夫，自己有一個漂

亮的家，在清靜而美麗的環境裏，養幾個可愛的孩子。所以當她們說不滿家室的話時，我說：

「但是你必須承認，這丈夫是你自己挑選的，孩子是你自己養的。」

吉鐸笑了，思綺也笑了。在笑容中，我很清楚的看出，她們對於自己的丈夫是驕傲的，對於自己的孩子是得意的。

於是，在吉鐸的家裏，我碰見了她的丈夫，也碰見她丈夫的母親——一個非常年輕的母親。我們談得很愉快。以後，吉鐸要對我寫一篇訪問記，我們兩個人對坐在沙發上，她問我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問我最近的寫作計劃，我說我正在設想寫一篇短篇小說，寫一個隔了二十年舊地重遊的人，約他過去的情人在一個過去常約會的地方見面；他到了那個地方，看看周圍的各種變化，靜靜的等她降臨，但是她一直沒有來，最後，有一個人送了封信來，說她不想再碰見他了，因為她願他仍保留她以前的印象。

吉鐸對於我這篇小說的設計很喜歡，她說希望我寫出來後就寄給她看。——而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寫。

她坐在我的對面，對我發問，用筆記錄，精神非常明朗瀟灑可愛，尤其是當她頭部偏動，頭髮波動起伏，身軀移動，手臂伸出交叉，我覺得她儀態很美。如果是一個美國女性，我一定會誇讚一句她的美麗，但是對一個中國的太太，這種誇讚會顯得我輕薄，我自然不敢隨便。

以後我從美國到日本又到臺灣，她的那篇訪問記已經在臺北中央日報上發表過，我沒有讀到。好像隔了許久，我回香港後她才寄給我的。

接着是她要我為她一本小說寫一篇序，在這篇序裏，我對她的小說並沒有十分頌揚，我說的是像她這種生活中所常有的小說題材的限度問題。她大概不十分喜歡，或者是出版商不十分喜歡，可能沒有採用；因為她沒有送我書。

對於年輕的朋友第一二部作品，我不敢太頌揚的原因，實在是期望他們將來有更好的作品產生。如果一動筆就稱之爲李清照、杜甫與莎士比亞，那麼怎麼能還有更好的東西。其次就是個人的經驗，當我初初寫詩的時候，我有一位老師楊丙辰教授，對我善意的讚許，記得他在大公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裏對我作過過份的稱許，使我有一種錯覺。這錯覺以後常使我感到臉紅。寫作越多，越發現自己缺乏「天才」，如果有一點點可驕傲的地方，實在都是痛苦與心血的結晶。

到底第一流天才是否可以完全不需要「生活」，這個我不知道，我想，即使有之，千古以來，也祇有可數的兩三個人。這幾個少數的「第一流天才」以外；文學作品，總還是要從生活提煉昇化而來。

生活的體驗可以廣，可以深；但必是在波難痛苦中產生的。如果陷於平庸而淺俗舒服安定的泥沼裏，想寫出偉大的作品可以說是不可可能的。書房裏的作品，沙龍裏的作品，襲用些西洋的寫作上新鮮的技巧，或描寫些沙龍裏有趣的瑣事與趣聞，可能是可愛的東西，但只是第三流的作品而已。

作家之需要生活，正如工業成品之需要原料。我們幾乎可以從現代的任何的作家看到他們如何追求生活：旅行、遊獵、冒險、參加戰爭、奔走革命，甚至是醇酒婦人，以至酗酒與吸毒……是好是壞，我們不敢說，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他們總是想跳出生活中平庸的樊籠，尋找一種新的經驗，來擴展他的視野與生活範圍。

這不妨說他們的氣質使然，但也可以說是他們的才華使他們不安於「室」，他們比別人更容易不滿於現狀，他們要求「飛揚」，要求「刺激」，要求「變動」，與「變化」。

所謂「江郎才盡」，照我想的，就是這「生活枯竭」，許多人說每個人都可以寫一部小說，這句話我相信可能是正確的；但我還相信很少人可以寫兩部小說。或者說，只有文學家才可以寫

兩部小說。許多作家寫了十部二十部的小說，分析起來，往往是一部的翻版而已。

作爲一個作家或藝術家，他們經不起「才盡」之苦，這也即是怕「生活枯竭」，因此有的怪家庭牽累他，有的怪社會限制他。他們感到苦痛。要免去這種苦痛，他唯一的辦法，是放棄藝術；他可以做別的不需要創作的事，他可以教書，也可以賣稿，他必須完全放棄要寫「沒有人寫過」的作品這種企圖。他必須改行。有人改行後的確非常愉快，有人則因爲仍要寫作，他下意識裏常有苦痛，他常常感到自己有點委屈。我有一個很有寫作才能的朋友，到馬來亞一個清靜的城市裏教書，起初以爲在清靜的環境中可以寫作。可是到了那面後，他同一個同事結了婚，兩個人收入不錯，分期付款，買了房子與汽車，養了兩個孩子，工餘有暇，在小圈子裏打牌應酬，日子很輕易地打發着。我於一九六二年去馬來亞，承他招待在那裏玩了幾天。我說：「你現在生活很安定，收入也不差，應該很快活了。」他說：「可是我的寫作的生命完了。」我看他仍在懷念他的寫作生命，就知道他不會十分快活，有一次同幾個人在一起，談到現在新出的一些可注意的作家時，他很有點不安，他始終在自信，如果他一直從事於寫作，他的成就一定會高於這些作家的。我當時自然也僅能隨便承諾而已。

放棄自己的天賦，（不管這「天賦」是多或少），是同放棄自己所愛的情人一樣，往往放棄了，而在久久以後，還會常常想到。許多人不能堅持他「天賦」的要求時，實際上也正是他「天賦」有限。一個有較高「天賦」的作家或藝術家，他一定要向「生活枯竭」挑戰，這可能會使他在道德上有缺點，使社會對他許多行爲有所誤解。我想這也可以解釋許多藝術家做出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太太，對不起子女，以及對不起自己的行爲。爲怕「生活枯竭」，他常會放棄安定而愉快的家庭，他會放棄美好的職業，也會放棄他父母爲他安排的美麗的前途，與自己當初以爲很好的某種生活格式。

當吉鐸坐在我對面訪問我的時候，我心裏想她應當是一個好的記者，（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她去美國時想進新聞學院，並且以後仍惋惜她沒有去實現這個志願的。）但當我看到她的美好舒適的家庭，與設想她每天的瑣碎生活時我就不覺生出一種疑問：難道這樣的環境也能產生很出色的作家麼？

吉鐸要以寫作消遣消遣她寂寞的家庭生活，這沒有甚麼，但她要想寫得成功。這當然是一件煩惱。作爲一個作家，一開始往往相信自己的天才，往後就知道「才」是很容易「盡」的，除非有生活的培養。天賦較高的作者，意識的與無意識就會發現，「成功」兩個字，第一步就是不落窠臼，不落人家的窠臼與不落自己的窠臼。要作品新鮮，就要生活豐富。因爲他必須要求生活。他可能要跳出家庭，投入社會運動，追隨革命，她可以去接受浪漫的愛情，她可以探求她所不熟識的人生。

作爲一個作家（或藝術家），有時候就需放棄許多東西，有時候也必須接受許多挑戰。這是局外人所不能了解的。

佛弟子修道，坐在菩提樹下打坐，有許多幻象來試探。先是猛虎毒蛇，再是利斧烈火，後乃美女獻情，又報父喪母病。一個作家或藝術家也有這種正正反反的試探。有許多天賦稍薄的人，埋於安定舒適生活中有之，奔而迎合時好者有之，變爲商，變爲官，變爲「學者」或「教授」者有之。他可能是聰敏能幹，但從此再不能創作，而只會開會演講了。

有許多作家，爲求「生活」的擴充而去革命，結果捲入「政治」，而放棄了寫作；有許多詩人，爲謀「生活」安定，而去經商，結果發了點財而不能寫詩。有許多音樂家爲養家而去教語言，最後就成了語言教員而放棄音樂。能在許多生活變化之中，在任何環境中，沒有忘去「寫作」的，則必是更有天賦的作家或詩人。當一個環境使他「才」盡之時，當一個環境使他發現「生活

枯竭」之時，他千方百計想換環境找刺激的則正是他的創作慾的要求。也正是他的天賦逼他有這個要求。

吉鐸也正是一個無意識的想從她的「生活樊籠」跳出來的作家。這也足夠證明她的天賦是較厚與較高的。我說她「無意識」的，則是因為她自己不知道她需要的是甚麼。她如果知道自己所企求的是「寫作」，她一定會往另一個角度去試探她可以跳出樊籠的門窗。

但是「寫作」是一件事，「生活」是一件事；生活不安定固然不能寫作，生活太安定了也不能「寫作」。近年來，我常常聽到人羨慕「太太作家」，說她們因為有丈夫養着她們，她們甚麼事都不需要做，可以專心寫東西。但是事實上，就因為可以甚麼事都不做，生活就越過越狹，一部兩部書以後，就再沒有甚麼可寫，再寫也變成玩七巧板一樣，只是把七塊相同的板變換一個擺法而已。

我常說，在這個世界上，寫作的「自由」與「獨立」是很難的。在獨裁國家中，寫作是政治任務，你不服從任務分配，你就不能生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作品是商品，你不跟從市場的需要，你就無法生活。

所以我說：「文學，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商場中，好像是賣淫的妓女，打扮越來越俗氣，粉越搽越厚，但越顯得可憐憔悴與空虛。文學，在獨裁國家中，好像是被蒙養的打手，越來越像獒犬，隨獨裁權威的增加，它對主人態度越來越卑微，對外人的面目越來越兇狠。」

於是有左派人士問我在這自由商場上賣文，是不是也算「賣淫」呢？

我想這是不必否認的。淪落在香港論字賣文的朋友，同「賣淫」的分別實在很少，不光是我，即左翼人士曹聚仁先生與葉靈鳳先生等也無法例外。其他像音樂家馬思聰在生活畫報上寫大陸現況，同賣淫也沒有甚麼不同？但何以他竟不在大陸做音樂家與音樂院院長呢？這些年來，香港

的舞場與酒吧，都是大陸出來的少女，她們難道都如此甘心墮落？這還不是因為她們在中共統治下無法生存嗎？她們賣淫，但她們還在養家。

在大陸被清算的作家與藝術家，如跪在地下頭戴高帽子的劉開渠、夏衍、葉淺予等，倘能到香港來過「賣淫」般的賣稿生活，恐怕正是求之不得之事吧！

有人說我不但賣淫，而且反共反華。我想這位先生真是一個不聽人民電臺廣播與不讀人民日報的反動份子。如果聽聽人民電臺的廣播與人民日報的社論，誰不知道反共反華是一小撮的當權派，是潛伏在共產黨內的反革命份子，如彭真吳晗甚至是劉少奇與鄧小平之大人物，徐訐何人，有甚麼資格與力量談得上「反共」與「反華」？

追悼吉鏗，談到寫作，寫作而至於賣稿，我不得不想到我們賣稿的生活的可憐。如果吉鏗知道寫作生涯是如此沒有前途，作品的好壞又是如此沒有標準的話。像我們認為也算有點成就的作家如丁玲、蕭軍、老舍、巴金、周立波、胡風、馮雪峯、周揚、歐陽山……等等，忽而都被判為反共反華，其作品又都變成毒物。那麼她也早該壓抑寫作的熱情而另謀昇華，這或者可使吉鏗不至於如此早死了吧？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